由于辽、西夏、金、元这几个非汉族王朝留存下来的史料不甚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尚不很多，因此只用一卷本的容量便足以囊括其中。

就本册剑桥中国史的内容来判断，前两朝的史料可能还要更少于后两朝。本书中关于辽和西夏的部分基本只涉及了政治史，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容或是捎带一提，或是直接忽略。而金朝部分虽然同样也只有一章的篇幅，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行政体制、经济状况、文化生活都有专门的小节。元朝的史料自然是最丰富的，其在中国史以及世界史的影响无疑也最大，本书的剩下六章都以蒙古-元帝国为主角展开。

令笔者感到欣喜的是，在本册的导言中，提出了以下的疑问：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 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

目前笔者尚不知晓该导言是谁所写，其是否参与了本册的正文部分的撰写工作，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没有得到解答。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疑问所导向的方向确实颇为值得重视，笔者尚未见到对这些问题比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宋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在明代呈现出衰退的问题。本册的编写又一次体现了这种“合作”方式所固有的弊端：作者之间不能分享一个共同的宏观判断。而且本书各章节的作者可能都缺乏导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历史纵深”意识，即同时关注当前朝代与更远的前后朝之间的关系、影响、改变。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

余英时在《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中仔细探究了明代廷杖制度的渊源，其暂时的结论为，明代“廷杖”之制，主要还是朱元璋本人的创造。本书的导言为廷杖制度的继承又提供了新的证据，其粗略地说，廷杖在异族人的朝廷是一件寻常的现象。但是，却没有明确说是在这四朝中的那一朝，或者是都有，同样可惜的是，正文部分也没有对此作深入地研究。考虑到明朝继承了元朝政府相当多的习俗与方法，我们或许可以假定明朝的“廷杖”之制亦与元朝的影响密不可分。

由于上述所说的，本书的作者都缺乏一种“通史”的观念与知识，以至于一些重要的问题得不到解答。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元朝对于中国在宋代所达到的文明所带来的断裂性影响究竟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理清宋代的发展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元朝的统治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改变，是仅仅使得文明发展暂时的停滞，还是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毁灭。本书的分析基本只停留在了对元朝一代，并没有比较的眼光，因此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只能够举出一些元朝带来的一些明显的“退步”。如元朝对于社会阶层实施的严格而细密的户籍分类管理制度，通过军户、匠户等囊括全社会的划分，人们获得了固定的世袭职业，社会流动性所带来的活力显然可能因此而得到抑制。此一政策几乎为朱元璋原封不动地继承。

其次是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学士大夫阶层地位地显著衰落。虽然在元朝士大夫仍旧享有一定地特权地位，但是中央权力的疏远无疑使得中国知识人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这与明初稀薄空疏的文化空气直接关联。或许可以说，明朝以前，从未有过哪一个王朝的初创是在这样一种缺乏文化的情形。

有一点颇值得好奇，那些在元朝担任了高官的色目人、蒙古人等非汉族人，进入明朝后除了跟随元廷逃入大漠，是否还有人在明朝治下生活，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蒙古人统治对于中华文明带来的断裂性影响无疑是真实的，只不过其程度如何、具体表现仍不十分明确。